



# 文化产业的规范与价值取向

艾 斐

文化产业既然是一种产业,其在生产流程、市场定位和价值目标上,就必然要遵循产业规律,这无疑是保障其实现正常运作的必要条件之一。但文化产业又绝然不同于一般的物质性产业,其在加工对象、效能目标和价值追求诸方面,都与物质性产业有着本质的区别,这就要求文化产业必须顾及文化的特点、符合文化的要求、具有文化的品质,在其产品和服务中鲜明而突出地传达出丰富的思想内蕴、正确的价值导向和积极的精神追求。

文化产业的勃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时代进步的表征。人类的社会生活自古以来就集中在两个基本点上:一为生产,二为消费。尽管这种生产和消费对于人类的需求来说,是刚性的、永恒的,但生产和消费的内容和方式却是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实现着提升。这种变化和提升的标志,往往就凸显在从物质化向着更精神化的过渡与飞跃,而实现这种过渡与飞跃的实质,则是对文化需求的愈趋热切和倚重。事实是,随着恩格尔系数的不断下降,人们对精神文化的消费需求也确实是在日甚一日地趋于迫切,并由此而带动了文化对社会的覆盖面的不断扩大和文化的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

文化消费是文化生产的前提条件,文化消费的不断扩大自然也就成为了文化生产实现发展的内在动力。正是由于文化消费和文化生产的这种循环往复式的互促与互济,才为文化产业的不断上扬和持续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场域和无尽的空间,不仅使文化产业越来越成为新兴的朝阳产业和恒定的支柱产业,而且即使是在全球经济遭遇金融危机的不利形势下,它也能化“危”为“机”,逆势而上、蓬勃发展,呈现出一派繁荣兴旺的景象。

这是文化产业的新优势,这同时也是时代发展的大趋势。只有充分认识这种新优势,不失时机地把文化产业做强、做大,才是科学的方略、明智的选择和有效的作为。因为在现代社会中,随着文化的精神、经济、社会、政治功能的全方位放大与深层次渗透,不仅使文化与“人”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而且文化自身也越来越具有了社会性和生产力的内涵,并已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文化产业作为一种以流程化、规模化、拷贝化、市场化方式大规模生产文化产品和进行文化服务的形制,其本身也就是社会生产力的特殊体现方式,又是传播和激励时代精神、民族情韵与大众智慧的有效途径。

文化产业作为产业,主要是指文化的物性内容;而不能产业的,则是文化的思想、精神、智能与道德内容。文化的这两部分内容既有严格的区别,同时又须臾不可分离,物性是精神的载体,精神是物性的灵魂。物性因赋有精神内容而产生价值,精神因有物性的装载和托举而得以有形和有行。尽管文化产品的市场价值往往主要是由其物性内容产生的,但这物性一旦失去其所赋有的精神内容,则会毫无意义;或者虽然赋有一定的内容,但却不真、不善、不美,那则会产生相反的意义。由此可见,只有当栖息在文化产品之物性价值中的

精神价值处于饱满和积极状态时,其物性价值才会真正具有实际价值和实际意义。否则,一本虽然装潢精美但却没有内容或者内容很差、很坏的书,其作为一本书的物性价值也定会随之而消失殆尽。

这,既是文化本性的体现,又是文化的属性使然。就像所有的物质生产都要求在其规范而合理的程序与规格中生产出优质的产品一样,文化则要求在生产它的产业链的终端所出现的,必须是能够起到心灵抚慰、思想认知、道德提升和精神导航作用的富于高尚情愫与隽永魅力的产品。否则,无论拥有多么豪华的物质外壳和精美包装,其效能和价值也仍旧会是销铄殆尽,甚至还会产生负面效应,造成对社会精神领域的污染和对人们心灵的戕害。

因消费需求而形成市场,因市场需求而促动生产,因生产效能而产生利润。在这个以文化为主体的链式循环圈中,消费是动因,生产是关键,赢利是目的。文化产业既然作为产业,就无法跳出这个链式循环圈的驭制和律动。但作为文化产业,与其他物性产业不同的是,它必须在这个循环圈的每一个环节上,都设定一个具有常效功能的思想“过滤器”和精神“导航仪”,并以此而将其全部生产流程和终端产品与服务牢牢地锁定在先进思想、科学认知和正确方向上。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在由精神创造切换为“文化生产”时不被易质,在由智能升华转换为商品销售时不被蜕变,也才能在从文化维度向商业维度的嫁接中伴随着对利润的获取而激活深栖于其中的精魂,进而汇聚成具有民族印记和时代标识的精神渊流和思想谱系。

我们所要建设和发展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型文化。为此,我们的文化产业也就自然是和必须是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而驱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下和航向中的文化产业,则只能是以先进文化和健康有益文化为其基本内涵和主体导向的产业结构、生产形制和市场法则,只能是在追求审美和效益共生、灵智和物质同在、精神和经济双赢的过程中,达臻生产规模化、实现利润最大化、走向效能社会化,以便在着力发展重点文化产业、促动新兴文化业态、扩大对外文化贸易、建设现代文化市场体系的同时,促进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不断加强,广大人民的精神风貌更加生气蓬勃、昂扬向上。

文化产业的发展必须与文化事业的发展相辅相成、互激互励、共济共荣,必须在有效增强国家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同时,亦能同样有效地激发全民族的创造力和提升人民大众的精神境界与文明素质,而决不能只在单纯和片面追求经济效益中率性地放弃了和冷落了对待情愫的陶冶、对道德的提升、对思想的引导和对精神的构建,更不能在产业化的过程中为了追求利润骤长而不惜使精神受伤。目前,一些文化产品的纯娱乐化倾向、纯商业化倾向、低俗和恶搞倾向、玄幻和悬疑倾向、浮华和浅薄倾向、颠覆传统和膜

拜舶来倾向等,虽然名目纷纭、花样繁多,但其源头和指向却大抵都只有一个,那便是基于对物欲、金钱和肉体的向往与祈拜。它们以满足市场需求、实行商业运作为由而堂而皇之地走向广阔的社会和输入大众的心灵,从而在其获得巨大商业利润的同时,却也形成了对民族精神的灼痛和对社会良知的否决。

其实,产业化并不与低俗化如影随形;追求利润也并不与崇尚良知相互抵牾。在本质意义上和正常情况下,只有内涵丰富、导向正确、形式新颖、品质纯正、时代精神强烈、民族特点鲜明、艺术风格质朴、生活气息浓郁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才是最具有思想意义和社会效益,同时也才会是最具商业价值与市场潜力的。这从以往的《英雄儿女》、《红岩》、《周恩来》、《生死抉择》,到后来的《西圣地》、《戈壁母亲》、《英雄时代》、《潜伏》、《大江东去》,再到如今的《解放》、《复兴之路》等所有获得“双效益”的文化产品中,便都可以得到有力的资证。

由此可见,那种以低俗化和庸俚化迎合市场的认识和做法,那种以矫饰和伪作冒充时尚的认识和做法,那种把精神内蕴和思想导向、审美意趣和认知效能、社会责任和时代使命、民族精神和大众情愫统统化解和消融在对利欲的追索之中的认识和做法,显然是既误读了文化的本质,又曲解了市场的法则。

振兴和发展文化产业不仅是历史的大律动和时代的大趋势,而且尤其是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引擎和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我们一定要积极参与和大力支持。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务求开拓、创新、循规律、走正路,始终坚持精神效益与市场利益的统一,道德建设与商业运作的统一、政治方向与价值取向的统一。只有这样,我们的文化产业才能实现快速而健康的发展,也才能如愿以偿地达到预期的效果和目标。

(作者单位:山西省社科院)



溪声入静

江作苏

白日喧嚣背后的空寂常常需要黑夜来填补和平衡,也许在深黯的苍穹所带来的无边宁静中,我们更能洞观沧桑世事,回望人生行止间的哀乐得失。在清寂的初秋夜晚,品读陆听的《乌啼集》,这样的感觉尤甚。事实上,仅“乌啼”二字以及封面的色调就已经让浮躁的心回归到了一种难言的安宁;幽蓝的夜空,似明若暗的浮云卷曲舒展,苍松虬枝盘曲,一轮明月高悬枝头,而乌鹊寻栖的啼声让秋夜的霜天更加寂靜。月华昭昭,清冷深远,人生倏忽间的往事、感怀与思索就在这苍穹中纷至沓来。

“文史闲谈”“往事随想”“流年梦影”“纸上留痕”“学海管窥”五部分内容博杂,风格各异,涉猎古今中外人、事、情、理,或慷慨或沉吟,或激情四溢或审慎思辨,或小桥流水或落日长天,无论所述如何,却总能从中读到如夜空般从容淡定、深沉幽静的心境。

在这些行云流水般的叙述中,最喜读“往事随想”和“流年梦影”两部分,其间的脉脉深情也最动人心弦。作为著名语言学家陆宗达的后人,作者自小家庭环境与文化熏陶不同一般,所遇之人、所见之事都充满浓浓的书香气。“往事随想”绕过诸位大家的学术贡献和文化大事,单从亲身经历耳濡目染、所见所感却又又不为人所知的日常琐事入手娓娓道来,陆宗达的浪漫、启功的豁达,张中行的质朴……读后时而捧腹,时而唏嘘。至于那些藏书旧事和因书结识的人物,更因朴实而历历如在眼前。对作者而言,他们是一个个真实多彩的学者、长辈和朋友,有令人景仰的治学之道,也有叹为观止的风雅人生。在日益浮躁的今天,这些可亲可敬的旧人旧事已渐行渐远,重读“往事”,竟有恍若幻梦之感。

“流年梦影”是书中极醒目的一组文章,因为题目齐整,意境优美,文字从容,而所述之人、事、情于静谧处又有一种淡淡的感怀,营造出如烟如梦的意境。文章中体现最多也感人至深的是作者

字里行间浓浓的乡情。在《乡情》《寻踪》《古巷》以及无限感怀的《城南》中,作者为这份爱倾尽笔墨,就算算入“纸上留痕”的文章里,也还要有专门一篇《故乡的爱》来述其衷情。正如作者所说,那是一种“对北京风情人物市井宛充满腔眷念以及随之而来的溶入血液深入骨髓的挚爱”。那种散淡又略带惆怅的笔触,将北京的文化性情、春夏秋冬、山水草木、市井风情无不描绘得令人心醉。本以为作者成长于“住来无白丁”的家庭,理当更爱阳春白雪般的北京,没想到树下乘凉的平民、街边的小饭馆、引车卖浆者的高腔大嗓这些市井情调、贩夫走卒的胡闹人生却更让作者流连忘返:“在这最嘈杂最市井最乱纷纷闹腾腾的地方,我却有了远离尘嚣的感觉……也许,这是我想象中的最真实最自然最去掉了浮华和光环的生活,使我能直窥人心中

最本质的生活欲望。”“那无穷无尽的街巷,却仿佛凝聚了遥远的岁月和广阔的生活,凝结了历史和沧桑,凝结了我对吾乡吾土的眷念和一种深深埋藏的希望。”将民间蓬勃的生命力视为率性而真实的生活本色,这样的思索与情感,只有穿越了浮华、淡定在心的人才会拥有;这样深沉的文字,也只有真正爱得“深入骨髓”的人才会从心底喷薄而出。而作者在其他篇章中或独自游园的喟叹,或驻足湖畔的反思,或寻访旧地的留恋,那秋日、蓝天、晚霞、夜色中的壮阔和如烟旧事的感怀,其实依然无不深藏着无尽的乡土眷恋,正是这座深爱的城市让作者忧伤、励志和深思。

在作者笔下,张中行“虽身处市井,却‘道通天地’;虽家居陋巷,而‘思入风云’”,既是高士,又是事关心切的“俗人”,是一个醉心于古典诗词与传统文化的儒雅之士,一字一词、一景一境常有独到见解;“纸上留痕”中是一个感怀时事的性情中人,一则新闻报道、一部电视剧都可以拍案而起;而“学海管窥”中又是一个思维严谨的治学之人;同时,还会谈地图,说收藏……

“终日挥形而神气无变,俯仰万机而淡然自若”,这大概是作者想用文字和思考向我们展示的一种人生境界。

近期,在参加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一次评审过程中,发现某地一份材料,把原本缘自盘王(盘瓠)信仰而形成的传统节日,改成了祭祀竹王的活动。这种种花接木之举着实令吾辈吃惊不小。问其故,答曰:作如是置换,项目易于申报成功。这又让我大跌眼镜!想不到,这竹王到如今一些人心目中还有如此“神力”,不禁使笔者想起前些年于湘、黔等省一度兴起的“夜郎热”。

提起夜郎,人们自然会想到“夜郎自大”这一世人皆知的成语。其典出自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太史公所记极其简略,可由此形成的成语却影响久远而广泛。而这位夜郎侯又被称为夜郎王和竹王。之所以有此称谓,与附丽其身上的奇异传说有关。对此,晋人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和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均有记载。说是从前有一妇人在河边洗衣,忽见水上漂来三节大竹子,且听到里面小儿哭声,于是她把竹子捞起来剖开,得一男孩,便抱回去抚养。孩子长大后,文武双全,做到了夜郎国之王。因以竹为姓,故称竹王。只因他问了一下汉朝使者:汉与夜郎谁大?竟竟落下“夜郎自大”的千古骂名。自然,“夜郎”这一带有贬义的名号,长期以来,人们也往往避而远之。

可是,到了本世纪初,随着旅游业的兴起,有“自大”嫌疑的“夜郎”王,却身价陡涨,变得吃香起来,顿时成为了人们的“抢手货”。多处地方竞相争夺“夜郎古国”、“夜郎中心”、“夜郎古城”的所有权,都说那是在本县市境内。有好几个县纷纷要求把县名改为“夜郎县”,有的还专门成立了“县改名领导小组”。又是开会动员,又是请人“论证”,又是拉媒体作宣传,一时闹得沸沸扬扬。在这场“夜郎热”争夺战中,以湖南某县的动作最令人瞩目,以致让在夜郎地望与夜郎历史的研究方面都占有绝对优势的贵州,一些人士也被弄得灰头土脸,自愧落入人后。于是有人无奈抱怨:既要平息“内争”,又要打好“外国战”,何等麻烦!在某些地方的“父母官”们看来,以为只要有了“夜郎”的招牌,外地游客就会不期而至,人民币就会滚滚而来,穷县就可以马上变成富

县。他们在高举“夜郎文化牌”时,却说不清夜郎文化为何物,有的在未弄清本地还是否属于古夜郎国的疆域之内的情况下,就匆匆忙向外界推出所谓某某“神秘夜郎文化之旅”,把本地区各种民族民间文化现象甚至新创作的文艺作品全贴上“夜郎”的标签。仿佛“夜郎文化”是一个可容纳古今文化的“回收站”。更有个别论者为迎合某些地方官员的需要,信口开河,置学术诚信、科学精神的底线于不顾。呜呼!如果古夜郎王有灵,他也一定被忽悠得不知何

处是他曾经治下的领地,何处曾是他生活的都城。他们只有在迷茫中叹息流落天涯无归路了!

笔者并不反对运用“夜郎文化”的资源来发展旅游业和文化产业。相反,倒是积极支持发掘、保护和合理运用这份珍贵的遗产。夜郎王虽然因夜郎方国的狭小而被人嘲笑为“自大”,但作为古夜郎民族及其后裔,他们所创造的独特文化和贡献,却不能认为是“自大”的。它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决不能轻视。问题在于,要加强保护和有效利用这份资源,首先得弄清楚它的传承主体、流传地域、它的内涵及特征。特别是对于后者,迄今却鲜有这样的研究成果。如果这些基本的问题都弄不清楚,难免出现误导性、歪曲性和庸俗性的开发及利用,也难免给旅客或消费者以虚假的文化产品及知识。这对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以及自身文化产业和旅游业的发展都将带来不利影响。“夜郎热”的消退,就说明了这

一点。公平地说,汉代的夜郎王为了弄清夜郎与汉谁为大,不吝求教于汉朝廷派来的使者,却也值得称许。因为他当时处于西南边地一隅,交通阻塞,信息不灵,他不知汉之广大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能求证于汉使者,这也说明他尚有求知的精神。将“夜郎自大”套在他头上两千多年之久是失之公允的。在今日,当我们在利用夜郎文化的时候,对其基本面貌、属性、特征都不去深入研究,在未弄清它本来面目的情况下,却只知急于打牌子,盲目套用,那岂不比“夜郎自大”的行为更可笑吗?



进入到诗情词意中去,身临其境地领会诗词的内涵。

品读这部书稿,似有一缕春风从心中掠过。透过这一篇篇畅想,我们会情不自禁地融入到古人的诗词情感世界中去,与先贤一起领略唐诗风骚,一起感受宋词情韵。一起踏游红尘紫陌,一起感喟世事沧桑。从中我们还会看到李白仗剑吟诗的风采,看到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的忧伤,看到苏轼赤壁怀古的豪放,看到黄庭坚与

秦观同朝退的身影,看到李清照深秋思人的悲怆。这些畅想之文,会让我们的思想和先贤一同澎湃,情感和诗人一同悲欢,脉搏和词家一同震颤。有志欣赏唐诗宋词风骚的人,不妨读一读,或许能从中受到一些启迪,得到一些引领,获得一些收益。

中华古典诗词是古代先贤智慧的结晶,古人的爱国情操、报国宏愿、思怨情仇、离情别绪,都通过诗词记载下来,传承至今,已成传统文化中最宝贵的精神遗产。这些诗词,无论是在思想内容上,还是在文化艺术水准上,都堪称一流。

日前,《中国军旅文学 50 年》暨当代军旅文学研讨会在解放军艺术学院举行。

《中国军旅文学 50 年(1949—1999)》由朱向前主持完成,2007 年由解放军出版社推出,2008 年又被纳入国家社科基金标志性工程——《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并由学习出版社出版。该书梳理了半个世纪以来军旅文学的历史,总结了军旅文学发展进程中的若干重要理

## 中国戏曲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

近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中国戏曲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关于戏曲的继承与发展、戏曲市场化、戏曲危机论等问题,曾一度引起戏曲研究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这一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新思想、新方法。一方面,新思想、新方法有助于增进人们对戏曲艺术规律的认识,另一方面一些不从实际出发的理论刻意标新立异,模糊了戏曲理论研究的方向。在这一背景下,来自中国、日本、韩国、美国、丹麦等国家和地区的 50 多位专家学

者汇聚北京,开展了为期 3 天的学术讨论。与会专家围绕中国戏曲美学特征再认识、戏曲改革与发展、中国戏曲表演体系的构建、中外戏剧理论研究等问题展开。从会议讨论中不难看出,扎实的学术训练和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是中国戏曲理论工作者必备的两大基石;厘清中国戏曲理论的核心概念,也是推动戏曲理论发展的前提。具备这些基本条件,戏曲理论的争鸣才是有意义的,否则戏曲理论研究难以取得真正的规范和突破。(徐 馨)

## 《中国军旅文学五十年》研讨会在京举行

论问题。以系统的理论规范和宏阔的学术视野将诸如短篇小说、中篇小说、长篇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理论批评、戏剧、电影、电视剧等不同文体的创作悉数纳入研究范围,以文学史研究的资料汇总和遴选梳理,以现象分析和理论阐释,勾勒、呈现了中国军旅文学 50 年来的发展脉络和流变轨迹。

与会者以《中国军旅文学 50 年》为话题,总结了新中国成立 60 年来军旅文学创作与军旅文学批评的成就与得失,并就新世纪军旅文学的发展走向进行了理性的分析与展望。(钟 文)